

蔣經國新傳

(一)

(本文插圖刊第二頁)

● 李甲孚 (前東吳大學教授、自由作家)

因緣巧合試寫新傳

中外雜誌約我寫蔣經國新傳，我卻久久沒有開筆，原因就是這位傳主曾任中華民國總統，是一位舉世聞名的傳奇人物，我早年跟他在工作上的關係也並不泛泛，要怎樣著筆寫他，才能把他刻劃得恰如其分是滿難的，而且他的第一手資料，在台灣很難找到。

(一)傳新國經蔣

事情和因緣都滿湊巧。今年(一九九三)夏天，我的長女曉蓉(現任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專任教師)，偕其夫婿丕冰峯博士自美國華府來台看我。我跟他二人閒聊時，問起江南為什麼寫那樣似是而非的蔣經國傳？冰峯說：回美後會把研究資料中心(冰峯在美主持的「中國研究資料中心」)保有的蔣經國一手資料寄來。秋節前二天，美國收藏大陸出版有關蔣經國的資料寄到，中外雜誌創辦人王成聖教授認為許多在大陸出版的東西在台灣還不普遍，而且有些記載頗有問題，還需加以考證補充析說，如蔣經國寫給他父親的信、蔣經國到俄國留學的原因等，都需要加以研究評析解說。因此，我將個人所搜集的資料，反

覆閱讀，比較研究，就我所知的真實情況，試寫新傳敬請中外讀者批評指教！

冰天雪地的苦生活

我把資料看完後，又去中央圖書館找到官方發行的蔣經國寫的「我在蘇聯的生活」十三篇，兩相對照之下，文字上都一樣。根據我的了解，這十三篇文章，是蔣經國用俄文寫成的日記。董偉康、賀若淵、王緒圻寫的「蔣經國在大陸」一書，第二章「冰天雪地」的「赴蘇之謎」說道：蔣經國「在蘇聯還保持著記日記的習慣，回國之後，一九四一年由他自行選印了旅蘇十三年的日記，一年選用一篇，共十三篇，分別冠以標題，反映了他在蘇聯期間的主要經歷，並從幾個側面敘述他的見聞和觀感，將之合為一書，書名『冰天雪地』，又名『我在蘇聯的生活』，僅印數百冊，編號登記，分贈黨國元老和新贛南若干高級幹部，註明不得外傳」。

一九三七年蔣經國回國後，他把他用俄文寫的這本在蘇聯記的日記給他父親蔣中正看，他父親要他親自譯成中文，董偉康等輯的蔣經國「赴

蘇之謎」，正是經國當年親自譯為中文的心血手稿，他確曾把這本日記分發當年在贛南的幹部看，曾是蔣經國的部屬又跟蔣經國發生「戀情」的章亞若，就保有蔣的這本著作，並曾送給他人看過，章亞若是我南昌同鄉(我本籍江西南城，一九一四年在南昌出生)，她只大我一歲。想起了這位同鄉小姐覺得她的遭遇太悲慘了，太不幸和太可憐了。

也有人說，民國三十三年，蔣經國在贛南任所，將留蘇日記十三篇彙成一本小冊子，取名為「冰天雪地」，大約印了壹萬本，有幾十本流傳於外，當時專員公署的某不願透露姓名的高級幹部，曾證實確曾閱讀過。

這本書遺失已久，流失數十年失而復得，聽說蔣經國本人生前經常查詢也沒有找到。官方編印蔣經國全集時，曾把這本小冊子拿給在贛南工作過的人求證，證明踏破鐵鞋四處去找不獲一見的书，而今卻得來不費工夫，是知日記所寫都是真的，而且官方發表的冰天雪地，蔣經國曾為它寫過一篇序，原文有以下兩百多字：

「民國二十八年冬，寇機肆虐漢口，狂



① 蔣經國（右）與夫人方良在俄國合影。

② 蔣經國夫婦（前排右三、右四）離俄返國時與中國駐蘇人員及眷屬合影。



炸家園，吾母毛太夫人竟罹慘劫，未留一言；傷歎痛歎，國難家仇，於斯已極！回憶三十年來，始而寄跡海上，繼而留學國外，長離膝下，十有餘年。且因郵電不通，音訊久疏，母不知兒生死，因抑鬱以成疾；兒亦未能親侍湯藥，以娛慈母之心。迨返國以後，復值抗倭軍興，遂即奉命主政一隅，又以事務叢脞，不獲日常侍養左右，撫育之恩，未報萬一，長夜漫漫，思親無已。唯有刻苦耐勞，盡忠職守，瀟雪國仇，以慰吾母之靈。謹選擇留蘇十三年日記十三篇，輯成是書，用以紀念吾母，並誌無涯之哀悼。」

官方註明蔣經國寫這本書的年月，起自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三日，至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止，跟我從美國得來的資料所記年月有點不太相同，因為後者沒有註明年月，而且書中用的年分是西元紀元。序文後面還註有「經國序於江西贛州」八字。

蔣經國既然親手譯出「我在蘇聯的生活」十三篇，以之反映他待在蘇聯十二年的經歷，這十三篇日記對經國的重要性就可知了。春秋時代的兵學家孫武（公元前五一五年），不也寫過一部名傳後世的「孫子兵法十三篇」嗎？當然，蔣經國寫的另一本「我在蘇聯的日子」，更具深長意義，非常珍貴，值得重視。

世間哪有永恆的痛苦

官方除了發表蔣經國寫的「我在蘇聯的生活

」外，還發表了他生前在台灣寫的「我在蘇聯的日子」一文，全文一萬二千多字。

「我在蘇聯的日子」，是蔣經國在溪口寫好的，在台北交給他的朋友克萊恩（Ray S. Cline）的。克萊恩自民國四十七年起，即在我國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台北分處處長，至民國五十二年才離職返美。他在書中敘述過下列一段話：

「我任職台北期間，蔣經國讓我看過一本簡便記事本，是他返回浙江不久，於一九三七年五月所寫。他要求我的妻子，也就是他的英文老師，把這本用中文寫成的回憶錄譯成英文，她照著他的意思做了，我們把譯好的打字稿交給他，供他存檔。蔣經國為這篇回憶錄，定名為『我在蘇聯的日子』。」

蔣經國並在這本回憶錄前面，寫了一篇前言，前兩段寫出他被送往蘇聯念書經過，第三段寫他於一九三七年回國，他住在故鄉溪口時，寫的這本回憶錄，他為它取了個書名，原文說：

「我十六歲時，在北平求學。我希望學法文，準備到法國深造。但是在當時——即公元一九二五年，我國我家都處於政治動盪之中。中共和俄共正設法在中國進行政治合作。

共黨分子固然想控制所有政治團體，並且最後接管整個中國大陸，但在一九二五年，他們在中國沒有什麼實力，因此他們與最初由孫中山先生領導、一九二五年以後由我父親蔣介石先生領導的國民黨合作

，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雙方的聯合歷時很短，因為在不久以後，共產黨人就開始反對國民黨，並且成為吾國吾民的死敵。

但是，在一九二五年，北平的『政治環境』看起來洋溢著國共（中共及俄共）友誼的氣氛。我本人亦惑於這種心理環境，徹底改變了我原來的計畫。年少的我，覺得應該和另外九十個即將啟程的學生一起被送往蘇聯念書。結果，我在蘇聯渡過了十二年，經歷了我一生中艱苦的日子，並且一嘗被羈留及放逐的滋味。蘇聯人覺得我父親是他們在中國奪權的最大障礙，所以我在抵達蘇聯之後，實質上就成了被他們脅持的人質。當年在我身邊發生的事，將永遠留在我心坎上。

一九三七年春天，我終於回國，並且在我故鄉溪口住了七個月。其間，我把我在蘇聯的經歷寫成了一本回憶錄，並且取了個書名叫做『我在蘇聯的日子』。

幾個月前，收拾架上的書本時，居然把這本回憶錄的手稿翻了出來，於是就拿起來、展讀一遍，重溫那些逝去已久的事情時，我不禁又回想起那一段悲慘生活的痛苦，並為之感慨不已！

我還記得，我回國不久，曾經跟余子玉（譯音），一位和我同時去蘇聯讀書的老朋友，談起我們在蘇聯的生活。我們當時不約而同地說：「那真是一場噩夢！」但是現在細想之下，發覺用『噩夢』二字來



①

① 在蘇俄工讀時的蔣經國。

② 蔣經國（二排右四）任石牌訓練班主任與高級班研究員合影，二排左三為作者李甲孚教授。



②

形容當時的情況，並不恰當。當年我們經歷的痛苦並非夢境，而是最殘酷、最慘痛的現實。

被折磨了十二年的我，對共產黨人摧殘年輕人的種種狡獪惡毒手段非常清楚。他們首先巧言令色地欺騙年輕人，盡惑他們，以及麻醉他們的思想，然後就採取恐怖手段來擺布及摧毀他們的人格。他們的最終目的，就是去除個人的自由意志，使人變成戴上枷鎖俯首聽命的奴隸。這些仗暴力及異端邪說的赤匪，就如設置陷阱的人一樣，年輕人假如沒有相當勇氣、決心，以及冒險犯難的精神，一旦失足其間，就難以自拔。

目前，中國大陸人民正與惡敵周旋，生活亦艱苦萬端。但祇要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盡心盡力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活在自由中國的我們，就有信心把我們的同胞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使我們的祖先脫離險境。由於我了解共產主義的兇殘及醜惡本質，我的反共意志和立場非常堅定，歷史使我們深信，祇要我們能在逆境中不屈不撓，民族復興是大有希望的。假如我們能夠這樣做，我們一定會成功。我堅信祇要人不否定人性尊嚴，他就沒有理由不反共。

去年中秋節秋收時分，頭上的一輪明月讓我賞玩了幾小時，月亮時而藏身雲間，看起來有一種朦朧之感。忽然，一陣乍

起的秋風，吹透了我被露水潤濕了的衣衫，胸臂間頓時感到一絲涼意，這使我意識到，時不我待，歲月不居，光陰就像流水一樣，一去不回。

雖然共產黨已經統治了大陸整整十四年，但我仍然認為，祇有我們自己才可以決定我們的命運。人生在世，逆境總是免不了，蓄意去迴避亦屬徒然。但祇要有勇氣有信心，所有艱難險阻，亦不外是對人的生命力的一種考驗而已。與其說這是不幸，不如說這是大幸。對於持這種人生哲學的人來說，世間哪有所謂永恆的痛苦，或無盡的困厄。」

最後一段，寫的是蔣經國對自己的反省，他問大家：「難道你不知道嚴冬過後，春天就會來臨嗎？」他在文中把這句話作為序言的結束，原文說：

「每當我感到極不舒服或不愉快時，我總是問我自己：『為什麼你不能忍受一點痛苦？誰告訴你黑夜之後沒有黎明？誰告訴你冬天的霜、雪、冰、雹不會溶解？誰告訴你今天的狂風暴雨祇會繼續變壞？誰告訴你失望之後就是絕望？難道你不曉得黑夜之後就是黎明嗎？難道你不知道嚴冬過後，春天就會來臨嗎？』」

在北平認識李大釗

蔣經國一九三七年回國後，先譯出他用俄文寫的「我在蘇聯的生活」，在意猶未盡之下，又

接著改用寫散文方式，寫出「我在蘇聯的日子」，採分年體寫出來。第一年寫一九二五年他在上海浦東中學念書時參加的「打倒帝國主義」的示威活動，他被推為浦東中學的領袖，接著，他去廣東見他父親，要參加革命軍，他父親不許，要他去北平求學，他在北平經邵力子的介紹，認識了李大釗，遂決定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即孫逸仙大學）就讀，他先到上海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啟程去莫斯科，經國說：

一九二五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帝國主義者向示威學生開槍，民情因此變得非常激憤。『打倒帝國主義者』以及『收回租界』等口號傳遍了全國各地。當時，我還是上海浦東中學的一個學生，參加了四次示威活動。每逢示威，或者進行抵制洋貨運動，我都被推為浦東中學的領袖。

慘案之後不久，各校學生相繼罷課。過了一個多月，學生非但沒有復課，而且還組織起來，準備舉行更多示威；再過了約一個半月，學潮才慢慢平靜下來。

那一年的暑假，我前往廣東探訪我父親。那時，廣東是國民革命的根據地，因此，『到廣東去』成了一句號召高瞻遠矚之士挺身對抗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嘹亮口號。到達廣東之後，我亦深受當地獨特的革命精神所感動。在黃埔軍校，我首次看到『聯俄』、『聯共』、『與工人農人聯合起來』等標語在校園內張貼起來。我在軍校校園內遇到許多俄國人。別人告訴我

，祇有俄國人才是中國人的朋友，蘇聯的統治者既非皇帝亦非上帝，而是工人和農民。

在這種情況下，我非常渴望參加革命軍。其實我從小就有志參軍，祇是抵達廣東後，這願望就變得更加強烈。

不過，父親卻不讓我的願望立即實現，反而把我送到北平求學，結果我祇在北平待了幾個月。在北平時，經由邵力子的介紹，我認識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李大釗。李大釗當時住在蘇聯大使館，透過他的引介，我認識了很多蘇聯人。有些朋友建議我去蘇聯留學。他們的建議深得我心，因為我也想了解蘇聯的政治組織，所以就決定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註：也作孫逸仙大學）就讀。為準備赴蘇聯，我先到上海，然後搭船北上。離滬之前，我正式加入了國民黨，年方十六的我就成了這個革命組織的一員，雖然我過去曾經參加學生運動，但事實上，前此我與任何一種既定的政治主張都無涉。」

一九二五年十月，蔣經國告別了上海，啟程前往莫斯科。

經國是搭乘一艘貨輪去俄國的，貨輪艙位是裝運牲口的，他忍受下來了，同行去的有九十位同學，他們在船上的生活相處得非常愉快，經國說：

「此行搭的是一艘貨輪，艙位原先是用來載運牲口的，氣味沖人欲嘔，我差點給

暈倒了。船在黃浦江下碇的五、六小時，我還打算上岸回家；但看到很多其他的同學留在他們的艙位內，我不禁自問：「他們能忍受，我為什麼不能？」我想，身為黃埔軍院校長之子，假如我中途開小差，一定會招來嚴苛的物議，於是，我說服了自己，留在船上。

貨輪出海後首天，船上大約九十位學生分成幾個小組，一起開會、聊天、讀書、用餐，大家都覺得很愉快。這雖然是我首次參加團體生活，但我發現這種生活有許多優點，非常有趣。當同學間進行熱烈討論時，我甚至還可以忘掉艙房裡的異味。在船上，我看了一些書，包括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我還細看了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Nikolai Bukharin's ABC of Communism)，這是我所看的第一部共產主義思想書籍。」

生性好奇求知慾強

莫斯科的前站海參崴終於到達了，蔣經國和九十位同學在海參崴上岸，改乘普通火車往莫斯科，在火車上足足待了二十五天，終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到達莫斯科，他說：

「我們在海參崴上岸後，改乘普通火車往莫斯科。每到一站，我們小組都派代表下車，宣講中山先生的遺教，以及國民革命的經過。當列車抵達西伯利亞某站時，我們利用列車停站的八小時，參加了一個

紀念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大型集會。工人和農民代表舉起「中國國民革命萬歲！」「中俄合作萬歲！」等標語，熱情接待我們。集會後，我們加入了遊行的行列。遊行時，蘇聯人唱了好些歌，有人給我們翻譯，說他們唱的是「前進，黎明就在前面……」。

遊行結束後，一位童子軍送給我一幀列寧的照片，並對我說：「這是全世界勞動者的領袖。」他還跟我討論了許多關於中國國民革命的問題。他不但聽說過孫中山先生及三民主義，他還知道北伐的目的，以及黃埔軍院校長就是蔣介石先生。他對中國政情的了解，當時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事後細想之下，遊行可能是預先蓄意安排的，祇是一種拉攏手段。他們對我、我的同學以及我的國家，本來就沒有什麼真正的興趣。

在蘇聯，倒是有一件事與我的預期完全相反。當初，我以為所有蘇聯人都生活得很好，不料我在西伯利亞所見到的，卻讓我大失所望。貧窮顯然是西伯利亞非常普遍的現象，乞丐及小偷經常在火車站出沒。由於我生性好奇，求知慾也很強，我非常留意陌生的事物。

在整整二十五天的火車旅途中，我並不會感到孤單，而在越過西伯利亞莽莽荒原之際，我還幾乎完全忘掉了嚴寒的天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的一個傍晚，我終

於抵達莫斯科。」

蔣經國到了莫斯科，就跟同學一同進了孫逸仙大學（即中山大學）念書了，九十位同學中，有人是國民黨，有人跟共產黨有關，有人是無黨派的，他說：

「抵達莫斯科之後，我就進了孫逸仙大學。部分與我同來的學生是國民黨黨員；另外有些與共產黨有淵源，卻也加入了國民黨，還有些是不屬任何黨派的。」

國民黨和共產黨員間經常發生衝突。在中山大學，有部分國民黨黨員學生，因為行為不端頗惹人反感。一般人有時覺得共產黨員行為比較檢點，作為也較有出息。

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有個支部，其組織和訓練方法都相當健全有序，它的黨員組織嚴密，並受到嚴格監督，而且永遠遵照中央集權領導的指示行事。他們生活簡樸，紀律嚴明，因此，我有一陣子對他們的活動產生了興趣，而且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也就是我們抵達蘇聯之後幾個星期，我加入了所謂共產主義青年團。

嗣後，我苦修俄文，也對與西方革命有關的科目與政治學及經濟學，下了一番苦功。我在學生刊物上發表了幾篇文章，其中兩篇是「中國的展望」與「中國北伐一定成功」。我覺得這些文章都寫得不錯，擲地有聲。」

在那種情形下，蔣經國結果還是「加入了所謂共產主義青年團」，但他看的書，則是「與西

方革命有關的科目」，而且在「苦修俄文」。讀者請注意：當時的中國國民黨的政策是「聯俄容共」，國民黨的清黨是以後的事。

經國在蘇聯念大學

蔣經國早年在溪口親筆翻譯他的俄文作品「我在蘇聯的生活」為中文，題前標明的年代是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七，內文第一篇為「孫逸仙大學」，是他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在俄國的日記，內容寫他在孫逸仙大學上早操、當值日生、早餐、跟工人談話、交友、上課、上街、參觀博物館、開小組會議、編壁報等，記得非常詳細。

經國說他早起跟同學們在大教堂前面上早操的樣子，是胸部向前挺，兩手叉腰，開始呼吸，起床做早操的時間，是莫斯科紅場大鐘打了七下的時候，那時候克里姆宮城上的天色，漸漸發出紅色，四十多個中國的男女青年，整齊的排在操場上做早操三十分鐘。早操之後，各自回校，學校前面街上的行人漸多，一群一群的工人，往莫斯科河對岸糖果工廠跑，夾著皮包的大學生，向莫斯科大學方面快走，後面來了一大隊紅軍，唱著軍歌，走過學校門口。紅軍身上穿的衣服與戴的帽子，不是紅的，他好奇的問俄國朋友，俄國友人回答說：「蘇聯軍隊稱紅軍，係因共產主義的旗幟是赤色的，軍隊為主義奮鬥，所以稱為紅軍」。這些話是別處聽不到的，算是為經國上了一堂政治課。

經國當寢室的值日生，應負責檢查監督寢室之清潔整齊。這跟筆者在我國待過的陸軍軍官學

校要求學生的大都相同，不同的是：俄國人無論冬夏，都用冷水洗臉，不用臉盆，都是在自來水龍頭下面用手捧水來洗。

經國說他看見教室火爐旁邊坐著一個工人，在看數學，和那人談話，才知道他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因生活困難，在外面做數小時苦工獲取工資維生。這是那時俄國大學生普遍情形，莫斯科大學學生，百分之八十九是工人，工人的早餐，只有一個黑麵包，兩個洋芋，那個學生工人名叫依物納夫，他們二人後來成了好朋友，經國曾跟他學習俄文。

孫逸仙大學第一天

經國回憶當天先上社會科學，次上經濟地理，第三堂上俄文，下午三時吃中飯，天已經黑暗了。他在半小時休息中，和朋友上街買東西，他去的和看到的商店都是小店，俄國同學說：革命之後，實行軍事共產主義，商業工業，都由國營，私人資本充公。革命時，經濟破壞厲害，共產黨決定：儘量發展國家工商業，同時允許私有資本的存在。那裡滿街的小商店，都是商人自己小本經營的生意。

下午四至六時，依照課程表參觀革命博物館，在教員領導下，到電車站登車，電車上的人，很客氣的讓學生進去又讓坐，電車中一個軍官，看見進來一個老婆婆，立即起來讓她坐，代她買車票，到了革命博物館，是一棟二層樓的黃色大屋，學生同紅軍參觀是免費的，其他參觀者，每人收費十五個哥比。

革命博物館的史料，係根據俄國歷史區分，共有下列十一類：

1. 俄國農奴制度。
2. 拉任與白客七十二人，所領導的俄國農民大暴動。
3. 土地制度的改良。
4. 俄國資本主義的開始發展。
5. 俄國馬克思主義組織的形成。
6. 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
7. 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
8. 一九一〇年革命潮流的高漲。
9.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
10.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
11. 國內戰爭。

經國和同學們參觀完畢回學校後，立即出席小組會議，討論「中國的革命與我們的任務」，會議開到吃晚飯時停止。

飯後，孫逸仙大學與莫斯科大學開聯歡會，雙方互相派代表致歡迎詞，並舉行遊藝晚會，十二時散會。

經國因擔任孫逸仙大學壁報「紅牆」的編輯員，做到夜晚十二點半，才把明日的「紅牆」編完，他為壁報寫了一篇「革命必先革心」的短評。這是蔣經國進入孫逸仙大學念書，第一天活動的細節，也是他寫「在孫逸仙大學」的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

站在窮苦人的一邊

蔣經國自小就在過窮苦生活，他去蘇俄留學

，只是十六歲的孩子，他在飄洋過海時，不像別的孩子坐大輪船的頭、二等艙，經國是黃埔軍校校長之子，卻搭貨輪出國，而且貨輪是運牲口的，人跟禽獸雖然只有「幾希」的差別，但總不能把人看成是牲口吧？蔣經國和九十位同學都忍受下去了，這是經國出國頭一次過窮苦生活。

蔣經國到了蘇俄之後，他待在冰天雪地中，過了十二年的窮苦生活。他當蘇俄的苦工、鑛工和人質，這是極盡人世難堪和最可憐、最悲慘的境遇，都忍受下來。作者小時候念古書，念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拿這段話刻劃蔣經國這個人，不是很恰當嗎？

蔣經國平日跟人聊天，或是向屬員講話，他都會講些很苦的故事和笑話。我的一位同在石牌訓練班高級幹部班第三期研究三個月名叫廖祖述的同學，他早年寫蔣經國講窮人作詩的笑話故事，我看後倍感親切，曾把那個笑話留了下來。今天我翻舊稿，發現了這篇短文，特地把它摘錄在下面，作為本文的小結：

廖祖述說蔣經國任行政院長時，有一年（時間大概是民六十一年前後）去金門跟那兒的官兵在一起過中秋節。當天晚上，經國在太武山上，與金門司令官等聊天，向大家講了下面一個很有教育意義的笑話。

蔣經國說：「有這麼一個下雪天，有四個人圍在一塊兒賞雪，其中有詩人、有做官的、有地主、還有一個叫化子，詩人詩興勃勃，提議大家

以賞雪為題，一人作一句打油詩，眾人附議，詩人便率先朗聲唸道：「大雪紛紛滿地」，這確是富有詩意；接下來做官的便說：「真是祥瑞之氣」，這也符合做官的身分。第三位地主想到瑞雪豐收，不禁眉開眼笑地接下一句：「何妨連下三年」。誰知道打著哆嗦的叫化子一聽了立刻掃興地接口：「放你娘的狗屁」？「故事一講完，大夥都哄堂大笑。這時，有人發問經國院長：「這四個人立場不一、水準不一、看法觀點各異，請問您贊成那一個人的看法呢？」這時，廖祖述搶著說：「我想院長一定是站在窮苦人的這一邊的。」蔣經國院長看了看廖祖述，會心的笑了一笑。（未完待續）

編輯報告

編者

△本誌三一九期第二頁插圖說明③應為：「右起：王憶芳的父母親與王成聖教授、熊啟放董事長合影。」

△三一九期一九頁第一段右起第六行第十字以下應為「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一日」特此補正。

△李梅山「學海軼聞趣事」自三一九期停止刊登，敬請讀者鑒諒。